

【统战问题】

中国抗战研究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黄革新, 李 昕

(长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以往论者较多关注侵华日军师团在中国战场上数量逐年增长幅度的大小,以及在各大战场上的分布比例,但在现代战争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军队的实际战斗力,把侵华日军量的增长同质的下降两者结合起来考查,更有利于全面认识中国抗战的贡献。在抗日战争的研究、宣传以及扩大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方面,中国的影视文化界同样负有重要责任。

关键词:中国抗战;实际战斗力;影视文化界;责任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4)04-0084-04

Rethinking of the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HUANG Ge-xin, LI X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It is beneficial to comprehe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by investigat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 increased quantity and the decreased quality of the Japanese army. According to the Anti-Japanese War, public medium takes the crucial commitment referring to the research, publicity and expanding the influence to the outside world.

Key words: the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real fighting capacity; the public medium; commitment

判断一国军事实力的强弱,军队的数量只是评估因素之一,在现代战争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军队的实际战斗力,经过严格训练高素质的指挥员与兵员在总兵力中所占据的比例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素。把侵华日军量的增长同质的下降两者结合起来考查,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抗战的贡献。二战结束至今虽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斗争在特殊的思想文化领域中从未停止过。对此中国的影视文化界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发挥影响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 战斗力已有明显下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2月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他著名的“炉边谈话”中强调指

出:中国“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顶住了日本的进攻,歼灭了几十万日本军人,消耗了大量的日本军需”,“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抵抗——因为这是最后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1]从罗斯福对中国抗战5年来成就的高度评价看,以下两个问题可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顶住了日本的进攻”的实际价值何在?第二、日军损失的兵员是否及时得到了补充,已补充兵员的实际作战能力如何?以往论者更多关注的是日本陆军师团总数逐年增长幅度的大小以及在各大战场上的分布比例,并用较详尽的数据列举出了从1937年到1945年间,日军总兵力从17个师团增加到了168个师团,^[2]准备本土决战时陆海空三军总兵力达700万人以上,等等。对数量的增长予以重视这固然不错,但数量并不等同于质量,在战争中军队的质量更为重要。对于上述问题笔者

收稿日期:2004-06-01

作者简介:黄革新(1954-),男,广东台山人,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二战史、交通史研究。

认为:第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军民主要是靠自己力量在独抗强敌;第二、在日军战斗力最强大之时中国没有被侵略者所征服,此点最为关键;第三、迫使日军停止战略进攻,抗战转入到相持阶段;第四、日军精锐在中国战场被大量消耗(七七事变前日军伤亡17.2万人,此后到1938年10月日军又被歼灭44.7万余人)。以上几点不仅是理解中国抗战所作贡献实际意义之所在,而且也是促使日军战斗力由高峰开始下降的转折点。日军在战争中兵员人数的损失虽然也得到了补充,但由于客观条件制约,为发动战争而经过长期准备的高素质兵员的损失却很难在短期内弥补上,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正如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所说:15个月战争中敌军锐气日减,“敌人原有的军力与经济力,是大大消耗了”,“这个消耗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这种消耗“不但不能取偿旧的,而且还须支付新的”。^[3]由于1937年以来中国军民的长期艰苦奋战,庞大的战力消耗使日军的老兵员与各级指挥官因伤亡而不断减少,到1941年前后日军的“老兵所剩无几,只有现役兵和年青的补充兵”,^[4]缺乏训练和装备的新兵员大量补充,导致日军总体战斗力明显下降。关于日军战斗力未能随着量的增长而提高,反而逐年下降的问题,日酋冈村宁次对中国派遣军王牌11军曾作过如下的评价:“其前线兵团中最精锐部队当属第一线第十一军的第三师团及第十三师团。重要战斗常以该两师团为骨干担任主攻,——我原为第十一军首任司令官,当时该军除第三、第十三两师团外,第六、第九、第十四、第二十一各师团亦皆精锐王牌军。但是,此次再度赴任汉口,即使第三、第十三师团亦再无钢筋铁骨之威,其他兵团的装备、战斗力等均较前明显降低。”^[4]再拿公认的精锐部队关东军来说,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一线兵力日益吃紧,驻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主力以及半数以上作战物资开始被陆续抽调到其它战场上,到1944年底关东军已经没有一个受过高度训练有作战经验的师团了。新补充兵员的来源是“经过彻底搜罗伪满的日人人伍,才拼凑成了24个师团和9个混成旅团,约75万人”。如果把经补充后的关东军战斗力换算成其过去的常备师,实际战斗力仅为原来的8个师团,下降了三分之二。此时的关东军不仅装备严重不足,对新兵进行正规有效的作战训练也难以进行,据有关资料记载:“关东军的兵员又膨胀起来。可是,这些部队的

实际战斗力怎样呢?即便是最老的师,也只有昭和19年(1944年)5月编成的第107师。其他都是在那以后新建的兵团。编制、素质、装备都很差,训练也不够。人员勉强补充够了,但武器很缺”。^[5]精锐部队关东军的实力下降了2/3,已经是徒有虚名,其它在战争的中后期新增师团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了。另以日军对武器总需求量的比例来说,就当时已有武器数量与新增部队兵员的需求量相比,步枪只有所需数量的50%,轻机枪为23%,步兵用火炮为28%,反坦克炮为74%,野、山炮为75%,^[5]武器装备缺口大也是使日军战斗力下降的重要因素。“战争后期补充到中国战场的士兵中,据说有的穿着草鞋,扛着木枪,引起了中国民众的讥笑。曾经以服装整齐化一而自豪的日本陆军,此时从里到外成了地地道道的乌合之众。”^[6]

“两军相对强者胜”。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数量虽然不大(1938年10月仅10余万人,到1940年底增至50万人左右),而且装备很差,但却有着顽强斗志,拥有极强战斗力,逐渐发展成为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侵略者对此也深有体会。据前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参谋塚本政登说:“中共八路军对日本军进行的战争,是一场任何条令都未写过、也从未体验过的特殊战争。”“他们擅长于夜间和山地进行远距离机动,因而日军常常处于内线被包围的境地。”“他们受过训练,其体力和脚力高我一筹”,“同样的时间日军只能爬过一座山,八路军能爬过三座山。”“日军在千百次大小围剿作战中基本上没有给中共军队以重大打击。与此相反,在围剿中日军司令部、小部队和后方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例却不胜枚举。”^[7]需要指出的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以老兵居多,包括许多由后方部队中抽调到前线受过训练的老兵,尽管在武器装备、训练程度及军官指挥能力等方面逊于日军,但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强,在徐州、武汉会战中顽强战斗曾给日军以出乎意料的沉重打击。1940年以后日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斗素质都已日渐下降,在正面战场有很长一段时间兵力仅30余万,甚至连制空权也已逐渐转移到中国军队手中。而此时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约达300万,但由于国民党当局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军队的实际战斗力下降等因素,丧失了抓住有利形势实施局部反攻的良机。在1941年10月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

上蒋介石无奈地批评部下说：“这样疲惫衰竭的敌人，我们为什么还不能消灭他，让他来去自如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军队实在太无用、太怯懦……不如从前。”

一般来说，战斗力由软、硬战力两部分所构成，军队战斗力的强弱首先取决于其软战力。软战力主要为军事思想、组织、训练、教育、士气等，硬战力主要为人力资源、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软战力强一方面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数量和装备等的不足，但另一方面也受物质资源等硬战力的制约（八路军如有过硬装备则战斗力会成倍增长）；反之亦然，如太平洋战场上美军主要是依靠其强大硬战力弥补了软战力的相对不足。在现代战争中能否保持军队有持续的强大战斗力，除物质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战双方战略预备队的准备状况（素质和数量），否则初始战斗力再强也将无济于事，日、德法西斯的先后败从军事角度看原因即在于此。

二、二战结束至今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斗争仍在银幕上继续较量

目前国内抗战学术研究总的来看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地拓展，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也日渐广泛，多年来已有不少高水平成果问世，然而中国抗战的成就至今仍然缺乏其应有的影响力，同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牺牲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地位很不相称，这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笔者认为，对中国抗战问题的关注不应只是学术界的事，在向公众普及有关抗战史知识、认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巨大危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扩大中国抗战所作贡献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保卫世界和平成果等方面，影视文化界同样负有义不容辞的政治和社会责任。而且优秀影视文艺作品在对人们思想观念上所能产生的影响以及震撼性效果，往往是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难以做到的，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够相得益彰。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国家，但多年来在美国有关二战的题材一直是影视拍摄的重点内容之一。尤其是近年来这方面的影视作品又新作迭出，如《辛得勒的名单》、《雷霆救兵》、《珍珠港》、《U-571》、《兄弟连》等，都作为大片在中国上映过（有的还获奥斯卡大奖）。不仅影片的艺术价值获得肯定，而且在宣传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贡献、扩大其全球影响力方面发挥出了突出作用。到目前

为止美军在二战中参加过所有重大战役，都已在银幕上得到了相应体现，既有票房价值又有社会效益，好莱坞的二战片也因此而历久不衰（美英等国还拍摄过大量的二战新闻纪录影片）。此外，前苏联作为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的主力军，以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题，也拍摄过大量的卫国战争片。如《攻克柏林》、《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青年近卫军》、《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等，这些影片也都在国际影坛上产生过很大反响，在中国也多次上映并获得了普遍好评，影响力也很大，直到今天仍不时在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出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和德国一些右翼势力近年来沉渣泛起，也在利用影视报刊等大众传媒工具，不断掀起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翻案，否认侵略战争的浊流。在日本，除包括首相在内的若干内阁成员不顾周边国家强烈反对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文部省在教科书中篡改侵略史实等政府行为外，右翼势力还利用各种宣传媒体极力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把日本描绘成战争的“受害者”，为军国主义者侵略罪行翻案。在这一背景下，不仅出现了打着学术研究旗号集中体现日本右翼势力历史观、宣扬侵略有理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等一些历史论著；而且1998年5月还公映了为战犯东条英机歌功颂德、所谓“在启发宣传上需要的和对国民教育有益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甚至把有关侵略内容利用高科技手段制作成电脑游戏软件毒害青少年。如1996年日本光荣公司制作涉及侵华战争的游戏《提督的决断》，内有众多侵略者如东条英机等人的形象出现，在游戏过程中，一旦日军获胜则画面一片欢腾，为此公司的11位中国员工集体提出抗议并有4人辞职。据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荒煤在他所著《攀登集》中记载，曾有一个在《大日本帝国》中扮演过东条英机的日本演员在记者招待会上这样说到：“由于战争失败了，东条英机这个形象被曲解了，真实情况被隐瞒了。我所以这次接受了这个任务，就是想通过电影教育后人知道‘事实就是这样’，自豪吧，日本人！这就是我在这部影片里要说的话。”由此可见，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张目、为军国主义招魂真是做到了不遗余力。在德国，“新法西斯分子经常聚集一地，偷放、复制纳粹党和第三帝国时期的影片，对有关冲锋队列队行进、希特勒演讲和战争场面的影片百看不厌。他们

还自拍影片、制作录像、灌制唱片,相互传看传听”。^[8]2004年4月30日,新纳粹组织在法国一处犹太人墓地入口的石柱上用德文写下了“一个人民、一个帝国、一个元首、胜利属于元首”的标语,并涂抹了许多纳粹党徽的图案。总之,国际上的反和平右翼势力利用大众传播体系,对公众特别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灌输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历史观,鼓吹侵略有理、战争无罪,其潜移默化影响犹如定时炸弹危害作用是不容轻视的,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与警惕。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可以断言,银幕上的反法西斯斗争还将继续下去。”^[9]

对于绵延14年波澜壮阔的伟大中国抗日战争,从文学剧本创作的角度来说,我们并不缺少好题材,甚至可说俯拾皆是。优秀的抗战题材影片应当是史实与艺术的有机结合体,溶思想性、教育性、观赏性于一体。中国电影工作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拍摄出《风云儿女》、《八百壮士》等优秀影片,对激励中华儿女奋起抗战救亡起了很大作用。新中国建立后在20世纪60年代拍摄了一批在国内影响广泛的抗战影片,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三进山城》、《小兵张嘎》等等,至今仍为不少人所怀念。即使在文革时期,样板戏中的《红灯记》、《沙家浜》等也属此类题材。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西安事变》、《七·七事变》、《血战台儿庄》、《南京大屠杀》等影片陆续问世。

对抗战影片作以上简要回顾,是想说明从时间跨度看,应当说中国影视文艺工作者在有关抗战题材的创作上多年来确已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和努力,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忘记自己的神圣职责,而且一些作品也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起到了警世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多年来中国几乎没有拍出几部能够在世界影坛上引起广泛影响、震撼人心的抗日战争大片。总的来说,与当前国外同行对于

反法西斯战争题材影片关注的深入程度以及成果相比较,中国影视界在主观努力等方面做的还不够,对经济效益的追逐,迎合市场,很大程度上成为不少影视创作的发动机。“假如从好莱坞战争片的视角来回首中国抗战题材影片的创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的抗战题材影片(或战争片)、特别是卓越的精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10]笔者很赞同上述观点,而且认为这应当是影视文化界、学术界共同负起的责任。衷心希望我们的学者、作家和编导们开阔视野相互沟通(包括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合作),早日拿出一批振奋民族精神,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史诗般壮丽的中国抗战大片来。

参考文献:

- [1] 罗斯福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2] 刘庭华.中国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
-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4] 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5]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6] 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8] 彭训厚.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经验的思考[J].军事历史研究,2000,(3).
- [9] 罗艺军.反法西斯电影反思录[J].电影艺术,1995,(6).
- [10] 周政保,张东.战争片与中国抗战题材故事片[J].文艺研究,1995,(5).

[责任编辑 杨彬智]